

飛

離

四

川

迎

向

光

明

楊森

劉文輝鄧錫侯鬆開了

民國三十八年共匪入川，兵分南北兩路，這兩路匪軍的頭目，一二十年前都曾當過我的部下，由南路而來的是劉伯承，由北邊南下的是賀龍，這兩個人論戰術和辦事的能力，劉伯承要比賀龍高明多了，不過賀龍在匪黨中資格比較老，他跟毛澤東的關係也比劉伯承密切得多，我一聽說劉伯承急於進攻成都，當時心裏便有一種感想，我認爲劉伯承這一着，充份表現他跟賀龍之間有矛盾，他一定是想跟賀龍爭先，——重慶和成都都被他打下來了，毛澤東該會讓他登上西南匪首的寶座了吧。

但是依我的看法，在劉伯承與賀龍的爭競之中，毛澤東不會支持劉伯承，這不僅由於劉伯承跟他關係較淺，而且劉伯承在國共戰爭期中是匪軍將領表現得最突出的一個，他的锋芒畢露，一定會引起匪軍老匪幹的忌刻，毛澤東沒有獨排衆議重用劉伯承的魄力，同時，毛澤東自己對於

劉伯承究竟信任到什麼程度，確實大有問題。

把匪軍裏面這個大矛盾抉發出來，我開始有了一個新的戰略觀念在逐漸形成。——在三臺駐防了一星期，接到命令要我們往廣漢開拔，應付可能由北部南竄之敵賀龍，於是我與孫德操兄整隊出發，去守成都正北的第一要隘，辛亥革命我會親手打下來的城池——廣漢。

在廣漢把部隊駐紮定了，我抽空到成都去見總裁蔣公，總裁對我這一次臨危受命，以及大轉進中的艱辛勞頓，竭力保全戰力，想和共匪一拼的那些事情，頗爲嘉勉了一番。我當時請示總裁，這以後我們究竟應該定什麼樣的一個方針，總裁作了原則性的指示後說：「關於協調配合的問題，將由大家開會討論決定。」

那一次會議是很重要的，出席的人不多，有張長官岳軍、蕭毅肅參謀長和我等多人，會議一開始，大家所討論的問題是怎麼打？至於應該要打是早經決定的策略，那是絕對不會改變的了，對於這一點，我更其覺得振奮，因爲我一直以爲

只要肯打一仗，西南大局一定會顯露曙光。但是接下去所聽到的，都是大家議論紛紛的在要釐訂作戰計劃，細微末節，喋喋不休，這時候我有點不耐煩了，我站起來就說：

「要打就打，沒有什麼好計劃的？現在，敵人還遠得很，我們既然決定要打，那麼任何地方都可以打。民國六年我替川軍解圍，只帶了萬把人守成都，朱德他們都把成都的四門圍定了，我還放心大膽的在皇城裏睡了一兩天一夜，爬起來，叫號兵吹集合號，帶着士兵做一陣體操，振作精神，開了城門就打出去。不但把圍城的滇軍全部打垮，還乘勝追擊，跑到了敗軍的前頭，當時身前的敵人的遠比我們多，其結果，我們又把瀘州打下來了。」

我將這段往事說完，再提供我認爲可行的辦法，我振振有詞的說：

「成都附近，我們還有很多的軍隊。這個仗還有什麼不可以打的？充其量，我們準備犧牲個萬把人，找個地點，跟共匪猛打一陣，先把這一

路轉進的劣勢扭轉過來。劉伯承也好，賀龍也好，他們進了四川以後，直到今天連一仗都還沒有打過呢，我們這出其不意的一陣猛打，他們一定措手不及，說不定還會大獲全勝，驅退他們的一路兵呢。只要打這一次勝仗，全國士氣民心自然大大的振作，局面一穩定下來，再徐圖發展，我不相信我們找不到出路。」

大家聽了我這一番慷慨陳詞，彷彿是在安慰我說：

「楊總司令這個意見當然很好，打是一定要打的。不過，應該採取怎樣的打法，我們還得訂定週密的計劃。」

會後通知劉文輝和鄧錫侯到成都來，共商大計，但是這兩個人已經準備賣身投靠了，躲在成都附近的彭縣和郫縣，那裏還敢到成都來？事後不久，我回到廣漢防地，有一天，他們派了一位代表，鬼鬼祟祟的，到廣漢來求見我和孫德操。

蒙羊場上變生肘腋

派來的代表是一位副官，他轉述劉文輝和鄧錫侯的意見，大意是說：

「現在共軍全部開到四川了，眼看馬上就要接收成都，祇有惠公和孫德公，還在對 蔣總統忠心耿耿。情況已經這麼嚴重了，我們四川人必須自己想個辦法，你們二位應該出來號召一下，明天我們在蒙羊場開會，務必請二位出席參加。」

我唯唯諾諾，不置可否，叫人帶那位副官代表去休息，他一走，我的高級幹部紛紛圍上來勸我，有人說鄧劉已經打算投共了，我萬萬不可自

陷虎吻，跑去開什麼會，也有人說蒙羊場這個地名，就對姓楊的不利，因此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去的。我請他們靜下來，然後說：鄧劉的居心當然我很曉得，不過此刻正好是他們給我機會，讓我弄清楚他們究竟想搞什麼名堂。說完了話，我再跟孫德操兄一商量，於是派人再去把那位副官找來。

我告訴他說：

「我和孫德操都不便去開會，不過，我們要派代表跟你一道回去。」

我派的代表是喻孟羣，孫德操派了董長安。

根據他們參加會議回來時的報告，那位副官一帶他們到蒙羊場，就打電話給劉文輝，說是我和孫德操沒有來，但是已經派了代表來出席會議，當時劉文輝就在電話裏回答：

「請喻代表和董代表都到彭縣來吧。」

一到彭縣，氣象已經大不相同，滿街貼了標語，和鄧錫侯劉文輝聯名的通電，內容的荒謬大膽，已可證實這兩個妄人是決定投共的了。喻孟羣和董長安硬起頭皮被帶到會場，劉文輝一看見他們二人便說：

「楊子惠和孫德操，都是我的老朋友。現在祇剩下成都這個彈丸之地，我敢說再過兩天成都也要完了，站在多年老友立場，我今天完全是爲了愛護他們兩位，希望他們趁這個最後機會，也加入我們這一邊。歇一口氣，他又提出了具體的辦法：「我跟鄧先生表明態度的通電，方才已經發出去了，楊先生和孫先生如果願意參加，那我們就再換一個通電發表，部隊的問題，可以等

事後慢慢的商議，」說到這裏，他很神秘，也很得意的笑了，故意提高聲音說：「請你們注意，共產黨現在派得有代表在我們這邊，我先請他出來，跟你們二位談談，」最後，他爲虎作倀，出言恫嚇的說：「有一點是你們二位事先必須認識清楚的，我幫老朋友的忙，這是給他們最後一次機會，參加了，就是我們的同志，不參加，共產黨大軍一到，非把他們兩個消滅不可！」

軟硬兼施的一席話說完，也不等喻孟羣和董長安開口表示意見，劉文輝接着就把那位共匪的代表請出來，是個老頭子，年紀相當大了，這位代表一登場，就用一副盛氣凌人的態度即席說話，他說：

「我們對於西南各省所做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老實不客氣說：全民抗戰的時候，我們就在計劃拿下西南，作爲共產黨的根據地，我們的西南機構，成立了不知有好多年了，前幾年，我們設在西安各地的電臺，都可以和延安方面直接通訊，因此，我們是早已料到會要進據四川的，今天我把這些事實列舉出來，用意也在於告訴大家，我們共產黨，一定會把大西南搞得很好！」

接下來，他們逼着喻孟羣、董長安當場表示態度，於是喻孟羣站起來不卑不亢的說：

「我是楊總司令的代表，各位今天所發表的意見，我負責在回去的時候轉達給我們楊總司令，不過，我還要代表楊總司令在事前先說一句話：士各有志，不能相強，大局雖然已經到了這個地步，但是，如果說是想要大家全體一致都掉轉

頭來反對中央政府，只怕也還是辦不到的。」

早在我和孫德操派出兩位代表以前，我先打長途電話到成都，把劉文輝鄧錫侯要在蒙羊場召開會議的事情，通知了有關方面，當時，我還很感慨說了一句預言：

「我們再不打，他們却要動手了！」

這句話，果然不幸而言中，喻孟羣和董長安回廣漢覆命的那一天，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劉文輝鄧錫侯詆譏中央，宣佈投共的聯名通電終於發表，至此變生肘腋，大事已不可為，令人不勝痛心慨嘆。而劉文輝鄧錫侯投匪後也沒有好下場。鄧錫侯早已抑鬱而死。劉文輝投共後立即遭到掃地出門。共匪派八十輛卡車把他大庾縣安仁鎮上的財產，劉文輝搜刮西康幾十年的積蓄，全部運到成都沒收。

當時盛文將軍奉命出任成都防衛總司令，相機處一切，劉文輝鄧錫侯的通電一發表，受盡四川全體同胞的唾罵，軍中弟兄，尤表憤激，盛文總司令派兵把劉文輝在成都的公館裏守衛的叛軍繳械，一時太快人心。那時候金圓券銀元券統統不管用了，我們部隊發餉，發的都是黃金。於是就有謠言，說這些黃金都是劉文輝家裏搜出來的。其實大謬不然，因為重慶中央銀行的庫存黃金，是我親自派人押運到成都，絲毫不爽的交到西南長官公署。

唐式遵孤軍成壯志

局勢越來越嚴重，我和孫德操商量如何對付

敵人，如何死裏求生？我從新核計剩餘的部隊，除了孫德操的兩萬人以外，就只剩了我二十軍的舊部一萬人，兩支兵力加起來，僅僅三萬人馬而已。

以這麼微薄的兵力，實在無法跟優勢的共軍一拼，但是我們誓死不肯投降，怎麼辦呢？最後決定的方針，是在廣漢守一天算一天，守到不能再守的時候，我們再把部隊帶到松潘高山峻嶺，人迹罕到之處，去打游擊。

沒有多久，盛文率部自成都轉進向匪軍出擊，（詳情已見盛將軍在本誌發表的成都突圍一文，效不多贅）。盛文一離開成都，王纘緒的力量便陡然膨脹起來，他自任成都衛戍司令，擺出背城借一的架勢，其實是想藉此抬高身價，便於和共匪商洽投降的條件。可惜的是此公一生玩弄權術，詭譎善變，因此誰都不肯跟他打交道。劉文輝和鄧錫侯決定靠攏，就單祇瞞住他一個人，不叫他曉得。王纘緒枯坐成都，越來越駭怕，於是他親自到廣漢，來找我和孫德操，想跟我們聯合在一起，再決定動向，記得當時他又鼓其三寸不爛之舌，在我面前討好賣乖的說：

「如今打進四川來的兩名共黨將領，賀龍和劉伯承，他們是曾經作過惠公的部下，同時也是我的部下，」——我心想，他這個說法大概是因為他曾一度當過我的參謀長，——他又說：「跟自己的老部下，還有什麼話不好說。你們二公千萬不要走，我們連在一起，力量才大。他們怕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不肯打，我們來打！惠公不是說過的嗎？劉伯承賀龍進四川，沒有打過

，我們只要打一次勝仗，就可以站得住了。認真說，共黨有什麼可怕的，尤其是我們有惠公領導，那就更不必怕啦！」

話確實說得很動聽，但是出自王纘緒之口，我到是不怕共產黨，獨獨怕他言不由衷，他這種人是轉個身就可以出賣朋友同志，搞不好我跟孫德操，乃至於胡宗南都可能被他扛起來，犧牲我們，作成他賣主求榮式的「戴罪立功」。大陸淪陷前後，共產黨用這四個字，不知道騙誘了多少意志不堅之徒。

我表面上保持聲色不動，當然我也不跟他們作什麼承諾或答覆，暗底下我知會孫德操，一定要對他小心提防，孫德操回報我一笑，他說：「這個人的毛病我還不曉得嗎？」

唐式遵在川軍將領中，大家都把他看成一個沒有頭腦，做事全憑一股熱勁衝動的人，抗戰初起他也自動請纓，帶了第二十一集團軍增援淞滬之戰，勝利以後他一心一意想做重慶市長，其間有一度我曾表示倦勁，他就自動向我表示，叫我把市長的位置讓給他，後來因為總統慰留，我確實辭不掉，他也就快然而退。多少年來，他一直在想要恢復過去的力量，重佔一塊地盤，共匪淹沒了大陸，國軍退到臺灣，他以為這是時勢造英雄的大好機會來臨，集合了他的親戚朋友和舊部，建立起一支隊伍，準備在四川大幹一場。籌備就緒以後，他特地到廣漢來看我，向我問計。我對於他的壯志非常敬佩，尤其站在反共的立場，他既然能够在兵荒馬亂的時期，建立一支武力，想跟共匪角逐的雄心，當然極表贊同，因

此我再三的勉勵他，不要再存有過去擁兵自重的陳腐思想，一切的一切，應以國家民族為前提，我反覆申言當前的潮流和趨勢，他居然也很虛心的表示接受，最後他毅然的向我說：他決心改變計劃，將他那支新建的部隊，拉到川康邊境的大小涼山，他要利用優越的地勢，長期和匪相週旋。於是，我更進一步的勸他不妨就在大小涼山建立游擊基地。

我很關切的問他缺少什麼？他說：最缺乏的是武器，因此我建議他，辛苦一點，帶隊伍翻過大小涼山，去找西昌警備總司令我們的老同學賀國光，他那邊存置的武器很多，一定可以撥一部份給他；以成他的壯志。同時我又告訴他，要在大小涼山打游擊的話，必須南聯賀國光，北拒共產黨，有這樣的一個聯合，如果得心應手，還可以保全西康東部的一片乾淨地。

他欣然的去了；一直到西昌，見了賀國光，賀國光給了他一千多支槍，他把槍下裝了兩三部卡車，運往涼山，萬萬沒有想到，他在途中竟和劉伯承一支斜出的部隊劈面相逢，短兵交接，唐式遵竟當場陣亡，我到臺灣四個月後聽到消息，心中非常難過，為之悵悵寡歡者多日。

一架飛機黯然離川

自從蕭毅肅因公走了，我一心急於要找胡宗南，和他聯絡，共同會商在此覆巢之下何以自處，只是代號一次次撥過去，他因公忙，偏是找不到他。這時候，劉伯承的大隊兼程挺進，匪都已經進佔簡陽，一過龍泉驛，即將兵臨成都危城了。這

時候，我意料中的匪酋內鬨果然顯露端倪，毛澤東聽說劉伯承快要攻進成都，立刻下令他全師後撤，撤回重慶整補，劉伯承心中當然明白，這是毛澤東一着厲害的棋，他要賀龍凌駕劉伯承之上，取成都這一齣戲，毛澤東就必須讓賀龍來唱。

賀龍入川，採行的是三國末期鄧艾入川的舊路，自甘肅省和四川毗鄰的文縣，越過甘川邊境摩天嶺，進抵平武，直下江油，從江油縣起，就有公路貫穿彰明、縣陽、羅江、德陽、廣漢、新都而直薄成都，這一條路，險絕天下，但是沿途要險重重，只要有人肯守，賀龍也無法越雷池一步。無人阻敵，匪軍自然不費一兵一卒，長驅直入，我和孫德操在廣漢一日數驚，和守成都的王繼緒連絡，他根本不加理會，無可奈何，我們決定仍然按照預定計劃，到松潘山區去打游擊。

就在死生不容間髮的頃刻，時任空軍成都軍區司令現任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徐煥昇將軍打電話到廣漢來，他在電話裏告訴我：

「奉參謀次長蕭毅肅轉來總裁的命令；要我負責接運您們二位到臺灣去。」

我聽到他這麼說，對於總裁的關懷愛護，一時真有無限的感奮，我停歇了一會，默然無語，然而軍情緊急，徐司令直在那邊催促我答覆，我只好說：「謝謝你，我們會儘快趕到機場上來。」

放下話筒，我跟孫德操商議定了，立刻召集軍師長高級幹部開會，由我宣佈我們既定的計劃，我說：我們兵微將寡，力量不大，跟共匪的大部隊作戰，實在是沒有什麼把握，然而從另一個

角度來看，我和孫德操一二十年來一直堅決反共，被我們殺了的共匪着實不少，因此我們兩個的目標未免太大了，既然留下無益，故所以我們想要暫時轉進到臺灣去。

我很誠懇的說完了這一席話，與會的高級將領一概表示熱烈支持，這一個場景使我十二萬分感動，接連下來，我們開始討論部隊的動向問題。我們商量好部隊移動，尋覓掩護，等將來反攻時，隨即樹起義幟的計劃後，方始離開廣漢。

臘鼓頻催，歲聿云暮，十二月十二日朔風呼號，氣壓甚低，我和孫德操黯然離別麾下忠貞將士，驅車趕赴成都飛機場。

成都附近的機場，以抗戰末期興修的新津機場最為壯觀，只是當時早已失陷，仍還控制在我方手中的，只是座落成都城郊的小飛機場。

我和孫德操身無長物，只帶了少數家眷趕到了那裏，我有田氏夫人和幾個小孩到了機場，其餘的家小全都留在大陸，我在大陸治軍從政，閱人多矣，經常看到一些官員，平時對部下演講訓話，慷慨激昂，義形於色，每每以文天祥史可法關大帝岳武穆自期，然而一到大難當頭，他們必定逃的逃，降的降，動作比任何人都快，而且不管逃是降，他們都會早早的為家眷安排，務期家小無缺而後已。而我，在四川桑梓之地出任艱鉅，我太無能，實在沒法顧到家裏，重慶撤退，我有十七八個孩子留在南開中學讀書，不要說是把他們帶出來，我連臨行向他們說聲再見的時候都沒有。

那天我們一到小飛機場，放眼時，飛機場

上空空蕩蕩的，一架飛機也沒有。那時候我確實很着急，我跟孫德操說：

「我們的部隊都走了，現在跑到這裏，偏偏又沒有飛機，你看這可怎麼辦？」

徐煥昇司令當時正站在我們身邊，他聽到我這麼說，竭力的安慰我說：

「楊總司令，不要緊，你肯號召的話，成都附近部隊多得很。」

生平最長的一夜

那真是我生平的最長一夜，天寒地凍，北風淒厲，在空曠遼闊的機場苦候，四圍是一團漆黑，黑漆一團中，外面的情勢危急到什麼程度，簡直無法逆料，——好不容易，天際出現了魚肚白，大家的精神陡然一震，正在這時，遠方傳來隆隆的馬達聲響。

一架空軍運輸機飄然降落，徐煥昇司令招呼大家魚貫登機，俄時便又起飛，成都平原，冬月蕭索，從機窗俯望，一片淒涼落寞現象，飛機往東南方向直航，故國江山，都在眼底百里千里的掠過，這時候，整個大陸已被紅流淹沒，再也看不見有一寸乾淨土了。

隨我撤退的，除了幾個年幼的孩子，只有田氏夫人。——這一天，是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長途飛行，共歷七個多小時，下午兩點來鐘，抵達海南島的海口機場，這座孤懸南海的大島，早已充滿戰時景象，我穿着皮大衣坐在飛機上外望，但見戰鬥機羣起落不停，跑道旁還有許多

運輸機，成千上百的工人，打着赤膊，川流不息的在搬運撤退物資，看到那些工人打赤膊都在淌汗，望望機上各人重裘在身，我不禁詫異的問：

「這些人是怎麼搞的？冬月連衣服都不穿，難道他們不怕冷嗎？」

移時，機門開啓，一下飛機，便發現天氣實在太熱，於是大家紛紛表演脫衣舞，從皮大衣脫到祇剩內衣內褲為止，衣服脫了稍覺涼快，但是看看自己身上，實在不像樣子，因此我們一到海口街上，頭一件事就是大買其襯衫和單褲。

在海口僅住一夜，十四日一早，再搭乘空軍專機，直飛臺灣，飛機在松山機場降落，纔下飛機，總裁早已派車來接，要我和孫德操到陽明山官邸同進午餐，我向田氏夫人交代了幾句，便匆匆和孫德操上陽明山，進入官邸後，總裁立刻召見，問過我們旅途的情形，總裁又十分關切的問：

「成都情形怎麼了？」

我將我所知道的情況，詳細報告，總裁很注意的傾聽，等我報告完畢，總裁說：

「這些時你們太辛苦了，吃過飯，早點回去休息吧。」總裁對於部屬的關切愛護，慈祥愷切，令我永生難忘。

我部猶仍出沒川康

從三十八年底，到四十二二年間，大陸不斷的有人逃出竹幕，其中不乏我的舊部和同鄉，根據他們非常可靠的敘述；我離開大陸以後，經過重新整補的二十軍，由軍長景嘉讓率領，退到成

都北邊的廣漢金堂一帶，根據原定的策略，暫時移動到鄧錫侯部隊駐在地的附近尋求掩護。成都淪陷，鄧錫侯賣身投靠，共匪毫不客氣的派人分別「驗收」鄧部降軍。有一批匪幹去收編我的二十軍，政工人員上臺講演，破口大罵領袖和我，不但措詞激烈，而且純粹是無中生有，他們忘記了二十軍是一支建軍二十餘年的老隊伍，官兵對黨國的忠貞，對我個人的感情，都是根深蒂固，不可動搖的，他們的污蔑譏罵激起了全體官兵的公憤，他們抄起槍來就幹，當場打死匪幹三十多名，然後整師開拔，進入松潘夷區，由於部隊集中目標太大，給養也很困難，於是化整為零，分別發展。

其中由何國基帶領的一個師，一直深入到西康最南端的○○，他曾輾轉打長途電話到臺北來，找到了我，向我報告行蹤和情況。當時有一位團長想要北上西康省○○，他也曾請我批准。不久，他又來過一次電話，說是部隊急切需要糧食補給，我千方百計的給他們想了點辦法。

直到四十三四年間，另一位師長○○也跟我建立了聯絡，他要求我設法請空軍派飛機，空投糧食彈藥援濟。他那一師人經過五六年轉戰四方，在共匪的大軍壓迫之下，仍還保持完整。經我向國防部連繫以後，立即派機空投支援，事後共匪廣播電臺在向我们喊話，說我們的空投無效，二十軍的部隊根本收不到。這是他們極為拙劣的宣傳，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的伎倆，不但暴露了他們的恐懼，而且，直接證明了我還有一支大軍存在西康省境之內。

